

就像是石落浪起,隨着中共十八屆三中全會《決定》的公佈,關於中國政治改革步伐大小、力度不夠的爭議,又再度掀起。

的確,從措辭上看,在政改方面沒有突破性的改變。與經濟改革方面衆多新的“亮點”相比,這一邊廂,闌珊依然。

很多年了,圍繞中國的政治改革,保守派和激進派之間一直進行着拉鋸攻防戰。在長年的攻防戰中,激進派形成了三個主攻方向:

第一個在市場方面,自稱“自由市場派”的人士,以市場自由化爲旗幟,主攻方向是“國退民進”;第二個在法治方面,自稱“憲政派”的人士,以憲政和法治爲旗幟,主攻方向是“法治中國”;第三個在民主方面,自稱“民主派”的人士,以自由民主爲旗幟,主攻方向是“實行民主”。

針對這三個方面,本屆三中全會實際上延續了一直以來的基本姿態——在三個方面的開放程度依次遞減:

在市場方面,三中全會進一步放開,將市場的地位從“基礎性作用”提陞至“決定性作用”;

在法治方面,略有放開,重申了“堅持黨的領導、人民當家作主、依法治國有機統一”的大原則之後,提出要“建設法治中國”,要“維護憲

編者按:我在2011年9月在中國重慶參加世界華文媒體論壇大會時,認識了一位《新西蘭聯合報》社長兼總編文揚先生。他經常向本報提供他的好文章希望與伊利華報讀者分享。文揚1957年出生於北京市,系統工程專業研究生學歷。以往經歷包括:中國海軍軍官,諮詢公司總經理(北京),投資公司執行董事(新加坡、香港),華文報社主編(新西蘭)和自由寫作者,出版物包括四本文揚文集和一本專著《中國力》。浦瑛



作者:文揚

三中《決定》關於政改說了什麼?

法法律權威,深化行政執法體制改革,確保依法獨立公正行使審判權檢察權,健全司法權力運行機制,完善人權司法保障制度。”

而在民主方面,基本上沒有鬆動,也是以“堅持黨的領導”爲前提,在此前提之下,“加快推進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制度化、規範化、程序化”、“發展更加廣泛、更加充分、更加健全的人民民主”。

可以說,這個差異性安排本身,就是本屆三

中全會關於政改不明說的說明,也大致反映了保守派一方一直以來的應對態勢。分析一下這個態勢的內在理由,有助於理解中國政治改革的問題實質所在。

政治問題的核心,歸根結底是權力問題,若撇除掉表層概念,直接深入到權力理論的核心當中,則有望得到一個關於中國政改問題的更爲清晰的圖景。

從權力理論上看,中國的最高權力掌握在執政的政黨手中,以一整套意識形態和政治理論爲基礎,本質上,這就屬於一種典型的政治權力。

政治權力帶有強制性,可以統制一切,阻止其他權力對它的取代,也可以代替一切,成爲唯一的社會權力。毛澤東在1958年8月的北戴河會議上講過一段話,“法律這個東西沒有也不行,但我們有我們的一套,不能靠法治去治多數人,民法、刑法那樣多條記得了?憲法是我參加制定的,我也記不得了,我們基本上不靠那些,主要靠決議、開會,一年開四次會,解決所有問題”。這就是政治代替法律。

改革開放,就是政治權力開始放棄對其他權力的代替,首先在經濟方面做出退讓,實現分權,其內在含義是:在經濟領域,政治權力允許資本權力、經濟權力等非政治性權力部分地取代自己。十八屆三中全會將市場的地位進一步提高,在越來越多的行業里,政治權力完全退出,任由資本權力和經濟權力做大,甚至高於政治權力。

同理,政治權力在法治和民主方面的退讓,也是一種分權,其含義是:除了經濟領域,在社會領域,政治權力也開始允許司法權力、輿論權力等非政治性權力部分地取代自己。

這樣來看就很清楚了,政改的最終目標,是

中國權力格局的根本改變,從當前這種政治權力一家獨大、其他權力臣服其下的“金字塔型”格局,改變爲政治權力與其他非政治權力平起平坐,各自割據、互有高下的“石林型”格局。

的確,這正是大多數西方社會中的權力格局。以美國爲例,華府所代表的政治權力,只是權力格局中的一角,它與華爾街所代表的資本權力、好萊塢所代表的大眾文化權力、大型媒體集團所代表的輿論權力、名牌大學所代表的知識權力等,基本上就是一個平起平坐、各自割據、互有高下的關係。所有這些巨大權力的擁有者們共同構成一個“統治聯盟”,對全美國乃至全世界實施統治。

這就引出了關於中國政改的真正的問題:

這樣一個各種權力分立的“石林型”格局,是否適用於中國這樣一個國家?尤其是考慮到,無論在古代歷史還是近現代歷史上,每當中央集權崩潰,國家立刻分裂,社會立刻解體,中國還從來沒有哪個時期長期穩定在一個分權平衡的狀態。

姑且假定中國有可能適應一個“石林型”權力格局,那麼,接下來的問題是:什麼人來填補政治權力退出後留下來的這些真空?政治權力的退出,如何在司法、輿論、文化、知識等這些與政治領域密不可分領域內進行?近年來的“大V現象”,很像是一個實驗,讓人們看到中國輿論場一旦遭遇篡權將會發生什麼。

還有一個新生的問題:被資本權力所主導的自由市場,如果不加管治和約束,市場最終將吞噬掉整個社會乃至國家。面對這樣一個形勢,一旦政治權力全面退縮,誰來制約資本?誰來規範市場?誰來保衛社會?

綜合上述,中國問題總是複雜的,也是特殊的,以上三個問題,觸碰到了在中國政改的深層考慮和採取保守態勢的基本理由。關於中國政改,一味盯着共產黨如何如何、習近平怎樣怎樣、或美國如何如何、西方怎樣怎樣,看不出多少究竟。激進派方面的解釋,長期以來一直圍繞着“執政黨貪戀權力”、“既得利益集團阻礙”、“極左思潮的影響”、“傳統政治的慣性”這幾個理由反復打轉,其實也早已被執政黨的政治實踐甩在了後面。

凡事都有表層和深層,從表層現象上看,似乎道理全在政改的激進派一方,但若從深層實質上看,保守派一方其實不無道理。本文替保守派一方亮出這些理由,也許會有助於討論的深入。

文揚 2013年11月22日

中國可以走出《開羅宣言》

又逢《開羅宣言》紀念日。對中國來說,這個紀念正在變得越來越沉重:整整七十年,該宣言提出要解決的台灣問題、日本問題,包括戰後國際秩序問題,卻統統都沒有解決。

紀念日前後,媒體不斷重提這份宣言,學者們繼續論證該宣言的有效性。其時正值英國首相卡梅倫訪華,CCTV某著名記者一臉嚴肅地詢問這位現任英國首相如何看待《開羅宣言》,對方以“它很重要”一語不咸不淡地搪塞了過去。試問:中國人想要的回答是什麼?如果卡梅倫回答說這份宣言現在繼續有效所有內容必須實行云云,中國人就拿到尚方寶劍了?可以用它向台獨分子和日本右翼開刀了?

其實,中國人大可不必如此糾結,不妨坦承,這份簡短宣言中的很大一部分已經失效,不再適用於今天了。試圖通過論證其法律地位和約束力來強化中國當前的政治立場,要求當事各方回到七十年前各自立場和關係格局中,近乎刻舟求劍,緣木求魚。

毋庸置疑,《開羅宣言》在簽署的當時起了重要作用,但國際形勢很快就發生了巨變。實際上,甚至還沒等二戰完全結束,各簽署方即開始了各自的背棄。

在中國方面,當然不是有意背棄,一百年來首次被當作大國、與美英平起平坐,以戰勝國身份參與戰後秩序重建,做夢都想不到的頂級國際地位,豈可輕易放棄?但中國自己的內政問題尚未解決,愈演愈烈的國共內戰完全打亂了美英最初的戰略設計;到了蔣介石政權瀕臨垮台時,美國就顧不得那一紙《開羅宣言》了,雖然還是要打壓日本,但卻也放棄了扶持中國的意圖。

歷史上,任何一個國際秩序,都是強國的鐵腕塑造,是其信念和利益的體現。一旦國際秩序有違其塑造者的本意,新的秩序就會出現,直到重新體現強國的信念和利益。

美英是二戰戰後國際秩序的塑造者,新中國成立,東西方冷戰開始,朝鮮戰爭爆發,這完全不在1943年的期望之中。於是美英乾脆推倒重來,通過1951年9月的《舊金山和約》和同時簽署的《日美安全條約》,重新進行了戰後安排。

從這時開始,《開羅宣言》實際上已面目全非。在中國一方,此中國已非彼中國,新中國成了美國的死敵,哪還是“三大盟國”之一,哪還有共同宗旨和目的?在美英一方,通過《舊金山和約》和《日美安全條約》確立的新秩序才是戰後新信念和新利益的體現,《開羅宣言》幫助美英贏得了太平洋戰爭,促成了日本的投降,主要的歷史任務業已完成,可以作廢了。

由於美國的另起爐竈,對於中國來說,繼續強調《開羅宣言》整體作爲國際文件的法律效力已不再有意義。明智的做法是:將《開羅宣言》的內容分成兩個不同部分對待:第一部分是“三大盟國”聯合打擊日本、剝奪其自一九一四年以來所奪得之領土;第二部分是迫使日本將

“在中國所竊取之領土,如東北四省、台灣、澎湖列島等”歸還給中國。做了這樣的區分之後,中國可以不再糾纏于第一部分所隱含的“戰後國際秩序”,美英中“三大盟國”共同懲罰日本這個宣言基調,早已不再存在,也不可能復活了。

但宣言的第二部分,卻有着比第一部分更爲深厚和堅實的法理基礎。因爲這部分並不是出於美英聯盟的考慮,甚至可以說與中國是否與美國結爲盟國並無直接關係,與中國後來的政權更替也沒有關係,它所體現的是自第一次世界大戰《凡爾賽和約》和《國際聯盟盟約》以來國際社會的基本原則,即制止侵略、懲罰一切竊取他國領土的行爲。

這就意味着,這一部分實際上是一般性的、超脫聯盟關係、永遠有效的一種強制。只要美英兩國自認代表國際社會,它們就必須要在宣言中做如此表述,即使當時它們預測到幾年之後的形勢變化,也不能不要求日本將它所竊取之中國的領土歸還中國,因爲這個強制要求的基本精神,與《凡爾賽和約》對德國的要求一致,與一戰後《國際聯盟盟約》和二戰後《聯合國憲章》的基本原則一致。

這才是今日中國所應該強調和堅持的。中國對日本歸還領土的要求,不應再是基於與美英聯盟關係的、附帶在美英國際秩序之下的、按照美英意圖並得到準許才提出來的,甚至也不是基於中國和日本兩國歷史恩怨而提出來的,更多的是基於中國作爲新興的世界大國、聯合國常任理事國、新的國際秩序的主導者,其自身對於一戰以來國際社會行爲準則的維護和捍衛,其自身對於新的國際秩序的信念。

七十年了,台灣問題沒解決,釣魚島問題沒解決,中日關係和國際秩序問題沒解決,這才是真正的問題。在解決這些問題方面,《開羅宣言》已經起不了多大作用,中國不必總拿這份老文件說事,完全可以從容地走出來,上個大台階,將自己的立場直接建立在符合中國信念和利益的新國際秩序的基本原則之上。

文揚 2013年12月4日



1943年,第二次世界大戰方酣之時,中、美、英三國領袖在埃及召開了開羅會議。圖中由左至右分別是蔣中正、富蘭克林·德拉諾·羅斯福、溫斯頓·邱吉爾。這次會議主要議題是對日作戰計畫及如何解決遠東問題。會後三國簽訂了《中美英三國開羅宣言》,並在俄國史達林同意後公布,是確定日本侵華罪行及處理戰後日本問題的重要外交文件。

美国 BMD 律师事务所

我们的律师经验丰富, 祝您事业马到功成

我们拥有超过50位律师的专业团队, 能为您提供在商务、房地产、税务、知识产权及证券金融等各个领域的法律服务。

欲了解更多详情, 请联系唐永昶律师或徐佳佳律师。



唐永昶律师
电话: 330-752-1959
电子邮箱: jtang@bmdllc.com



徐佳佳律师
电话: 330-253-9195
电子邮箱: vxu@bmdllc.com



BRENNAN, MANNA & DIAMOND
ATTORNEYS & COUNSELORS AT LAW

地址: 75 East Market Street, Akron, Ohio 44308
网站: www.bmdllc.com

百味堂 中醫師 朱銀海

BAI WEI HERBAL STORE
YINHAI ZHU Chinese Herbalist
三十多年臨床經驗,專治療疑難雜症
3820 Superior Ave. Cleveland OH 44114
Tel/Fax 216-696-1637 Cell: 216-470-5644

房地产经纪 Lucy Hu (胡仲平)

專營房屋地產買賣
免費提供地產信息
耐心周到優惠服務

OwnerLand REALTY
www.ownerlandrealty.com
lucy@ownerlandrealty.com
(440) 725-4459
(440) 605-1414